

农村娃上中国名牌大学的故事

马远征

(接上期) 吴努总理讲的是信仰佛教的有神论，周总理在这种场合不便表态，但马寅初校长一直拉着他，台下经久不息的掌声一浪高过一浪。周总理笑容满面地走上讲台，说：刚才

我听了吴努总理一番内容丰富的哲学演讲，这充分体现了我党提倡的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方针，我表示热烈欢迎。针对吴努总理邀请周总理到缅甸受戒3个月，周总理说，吴

努总理讲佛学修行的第三种境界是对外界事物的概不反应，我现在已经达到了这种境界。周总理短短几句掷地有声的话，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。面对吴努总理滔滔不绝地大讲唯心主

义佛学如何表态？既不能违反原则表示支持，又不能有损国际友人的面子表示反对。周总理上述表态既彬彬有礼又非常有分寸，真不愧是伟大的外交家！

印象深刻的学术报告

在北京上大学聆听领导、专家、学者的学术报告是学知识、长本领的一条重要渠道。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作关于“一分为二、合二为一”的报告，引起了全国哲学界一场大辩论。陈伯达在北京大学给人民大学、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老师、学生作了一次关于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报告。陈伯达一口福建闽南音，我们一句也听不懂，主办方专门请了北京大学语言学家王力为他翻译。陈伯达这次讲话，绝大部分引用毛主席的话，他自己的话很少。此外，我们还有幸聆听了中国哲学家、逻辑学家金岳霖的关于形式逻辑的报告，哲学家关锋的学习辩证逻辑的报告，还有艾思奇、何干之、孙定国等人的学术报告。

听冯友兰先生的报告，至

今让我印象深刻。那是1956年的初冬，地点在学校海运仓小礼堂。当时冯友兰先生刚过耳顺之年，留着一撮美髯，看上去颇有遗老风范。冯先生是河南唐河人，口音仍留有河南味儿。他讲话慢条斯理，句句耐人寻味。他讲的内容是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。他说，在中国哲学史上，有些哲学命题具有两方面的意义，一是抽象的意义，一是具体的意义。如果只注意一方面，忽视了另一方面是不对的。他举例说：比如《论语》一开始就讲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”。从这句话的具体意义来看，孔子让入学的无非是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等传统的東西。这些从现在来看没有多大用处，因为我们现在学的不是这些，用不着继承它。如果从这句话的抽象意义来看，则是说

无论学什么东西，学了之后要及时地不断地去温习、实践，这都是很快乐的事，从这层意义上讲，这句话还是正确的、有用，是可以继承的，这就是它的抽象意义。但是，并不是所有的命题都具有这两方面的意义，有的话抽象意义不多，只有具体意义。如“君君、臣臣”是说国君要有国君的样子、大臣要有大臣的样子，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，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，国君和大臣都不存在了。因此，这句话也就没有什么意义可继承了。可是“父父、子子”就不同了，父亲要有做父亲的样子，儿子要有当儿子的样子，这无论何时都是不能改变的，都是应该继承的。再如孔子所说：“君使臣以礼，臣使君以忠”这句话没有什么可继承的，

然而这个“忠”的思想，这个“忠”的抽象意义还是可以继承的，就像现在说的忠于祖国、忠于人民一样，对祖国对人民还是要忠。

听了冯先生的演讲，我们都感到很受启发，有茅塞顿开之感。冯先生提出对历史遗产的继承有两个方面的意义，即具体意义和抽象意义，我少年时曾熟背孔子的《论语》，特别是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”，当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现在运用冯先生讲的具体意义和抽象意义，就为我们指明了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：对待历史遗产问题不能一点论，要两点论，只抓住一点，不及其他的片面的。有的历史遗产具体意义过时了，但抽象意义还有，这就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古为今用的广阔道路。

“大鸣大放”

哲学系200多名学生怀着崇高的责任感和自豪感端坐在教室里，聆听老师讲课。我是学校哲学系第一批本科生，接受的是当时堪称国内一流的哲学教育。我们6班28名同学，绝大多数来自各省省会城市。每逢召开讨论会，大家都滔滔不绝、旁征博引，什么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怎么说，什么唯物主义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如何讲等等。记得有一位同学坐在板凳上，昂着脖子，露出傲视群雄的神情。党支部书记郝骥如问他为什么不发言，他说：“如果我的发言不能调动千军万马，那我就不用发言！”看到这种场面，我很自

卑，觉得自己读书太少，知识面太窄，插不上嘴，只有埋头读书、苦心钻研，才能一步一步地赶上大家的步伐！

1957年春天，党中央号召反对官僚主义、宗派主义、教条主义，开展整风运动。课停了，正常的教学秩序打乱了，学生以班为单位，学习文件，开展“大鸣大放”。6班在郝骥如的主持下，每天集中在6排最东头两间宿舍内学文件、搞“大鸣大放”。有的同学提出，人民大学学术空气淡薄，师资力量相对不足。在郝骥如的主持下，讨论始终围绕主题逐步深入。系领导只管大事，班里的日常工作都由郝骥如主持，

我们都称他“年轻老干部”。他老练成熟，遇事有主见。他家在河北省平顺县农村，是解放老区，他11岁就参加了儿童团，并且还当上了团长。他经常跟随父母上山逃避日军的轰炸和扫荡。新中国成立之初，他第一次进城，听到汽车响，急忙趴在地上。别人看见了，很奇怪地问他：小朋友，你趴在地上干什么？郝骥如说：“我以为是敌人的飞机又来轰炸呢！”众人听了哈哈大笑。我的出身和经历与郝骥如有许多相似之处。我家是睢(县)杞(县)太(太康县)老革命根据地中心区，我也参加过儿童团，在村头站岗放哨，上初中、高中时一直都是班

干部、班主任。但是与郝骥如相比，无论哪方面，我都自愧不如。

有一天，学校布告栏里贴出了哲学系的第一张大字报，题目仿鲁迅笔法，叫作《不在沉默中爆发，就在沉默中死亡》，鼓动大家“大鸣大放”。我班从经济系转过来的上海调干生潘某某，带头挑起“并系运动”。他提出人民大学不具备办哲学系条件，应该和北京大学哲学系合并。他还用大民主的方式把教育部和人民大学领导召集起来，叫他们表态并系，打乱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。后来，学校根据上级部署，开展反右派斗争，潘某某被划成右派分子。

办厂

1957年暑假过后，人民大学哲学系搬到了西郊，我们住在靠近学校西大门的第一排平房里，这时又恢复了往日正常的教学秩序，老师、学生都按部就班上课、学习。在“大鸣大放”中，社会上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大肆攻击人民大学死守

着马列主义不放，是“教条主义大蜂窝。”对于恶意攻击，我们进行了必要的反击，但是教学中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确实是存在的。哲学从象牙塔里解放出来，学哲学的人也必须投身到现实生活中去。如何投身到现实生活中去，学校、系领

导有了一个逐步认识、逐步深化、逐步完善的过程。

学校一开始提出要办工厂，但学校一无厂房，二无设备，如何办工厂？

(未完待续)



——讲一讲我们自己的故事